

国 语 文 学 史

胡适著译精品选
● 胡适 / 著



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
疑將人安在不疑處
不疑

胡適



安徽教育出版社

文学史

国语

胡适著译精品选
胡适 / 著

GUOYU
WENXUESHI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语文学史 / 胡适著. — 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 10

(胡适著译精品选)

ISBN 7-5336-2288-X

I. 国… II. 胡… III. 汉语—文学史—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2274 号

责任编辑:蔡宏淑

装帧设计:包云鸿 吴亢宗 王为民 黄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5.625

字 数:150 000

版 次: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 000

定 价:10.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出 版 说 明

胡适著述甚丰，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多有开创性的贡献。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本社在出版《胡适全集》之前，先行出版胡适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译）作。这些著（译）作的出版，或采用初版，或采用较善版本。书中个别有误植、脱字、衍字之处，均予改正。

《国语文学史》原系作者在教育部主办的第3届国语讲习所主讲“国语文学史”课程时所用讲义的石印本，凡15讲，约8万字，编写于1921年11月至次年1月间。1922年3月，作者赴天津的直隶国语讲习所（设在南开学校）主讲同一课程，对上述石印讲义有所删改，并在章节体例上调整为3讲（3编）。同年暑假，作者又到南开学校讲学，遂把上述删改本印成油印本。再至同年12月，作者赴教育部第4届国语讲习所讲课，终以前一油印本为底本略作修改，另行印成改订的油印本。

在此之后，黎锦熙（劭西）在为北京师范学校等校授课时，曾对上述改订的油印本再作若干改订增补（包括割截凑合

第1次石印本的部分内容)，亦印成临时的讲义本。至1927年初，北京师范学校的部分学生欲把经黎氏改订增补的临时讲义本作为参考讲义而重印，由于当时胡适正在国外，遂由黎氏同意决定，交付北京文化学社于1927年4月印成铅印本。由此可知，此书仍非正式出版，亦非定本。后来胡适本人也承认，这是一本“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白话文学史·自序》）

北京文化学社的铅印本《国语文学史》正文凡3编，共分15章，约9万字。卷首冠以黎锦熙的《代序——致张陈卿、李时、张希贤等书》，卷末则以胡适的另一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包括日本译《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序）作为“附录”，约5万字，“附录”文后又有“附注（一）”，即《李宝嘉、吴沃尧合传》，此系黎氏所添加，录自尘梦《中国近代两小说家传》。该本封面由疑古玄同（即钱玄同）题签。

《国语文学史》即以北京文化学社的铅印本为底本进行整理，并保留黎锦熙的《代序》。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吸收了一些胡适著作整理和研究成果，谨致谢意！

1999年6月

代 序

致张陈卿、李时、张希贤等书

陈卿诸兄：

前回您来谈及您和好几十位同学打算集资把胡适之先生前几年所编的《国语文学史》讲义排印出来，恰巧有文化学社邵砚田先生愿意承印；也好！可惜我补编的那些材料，因为事隔数年，再也找不出来了；仅仅找出来一些校订的原讲义，其中也略有几处增补的，已经交给邵先生去了。

他这部讲义从汉魏六朝编到南宋为止，没有头尾，只是文学史的中段。他的初稿是民国十年（一九二一）给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编的。他写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

格物君子无出施耐庵先生右者!”^①正当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半，这一年就与金圣叹的这两句话同时完了，他还在讲义稿上作了一个纪念。国语讲习所是两个月毕业的；过了年，不久就举行毕业式，不但他的讲义编不完，就是我的《国语文法》，《国语教学法》，还有钱玄同先生连编带写石印的《声韵沿革》，也都是戛然中止的。这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假使那时候的部章把国语讲习所定为四个月，我想他这部书的工作一定完成了。

次年（一九二二）四月^②，我在天津的直隶国语讲习所讲演，胡先生也来到，他在旅馆里把这讲义的章节次序移动了一些。那年十二月，教育部办第四届国语讲习所，他又把它删改了几处——这就是现在付印之本。那年的国语讲习所已成强弩之末了：各省派来的学员大不如前三届之盛了，在京投考的也不多了，教育部也渐渐的闹穷了，从前的石印讲义也改为油印了，现在你们付印的就是这种很不清楚的油印改订本。自然，那时大家都没有兴致把各种讲义继续编完；这第四届也就是教育部最末届的国语讲习所了。

自此以后，我在北京师范等处有时也讲讲国语文学史，就把他的改订本再改订增补了一些，印作临时

① 底本中原有注明底本相应页码的文字删去。下同。——编者

② 查胡适的日记，当为三月。——编者

的讲义，也始终没有弄成一部首尾完备的书。我屡次向他提及，希望他自己破点儿工夫编成，但他的计划改变了，打算编一部完全的中国文学史，不限于国语一方面。前年（一九二五）夏天，我在中央公园看见他，问他《胡适文存二集》中，连那些《努力》的“这一周”^①无关轻重的短评都收进去了，何以不在《国语文学史》中间挑选几章精当的收进去？他才恍然，说当时可没有想到这一点。可见这部讲义并非他称心得意之作，所以自己不大注意；而我给弥缝补苴的那些材料，更不过为一时教授上的便利计，尤其不值得注意，所以到现在也就并无存稿。

但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商务馆也出了一部凌独见先生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凌先生就是第三届国语讲习所毕业的，他曾写信叫我作了一篇序（用注音字母写的）；序中说“他搜集材料很不少，很足表示他读书的勤快。”他自序也说他编这书的目的是在勉励自己读书；这不过是一部“读书录”罢了。我倒赞成他这句话。所以，学校里要教《国语文学史》的，想得到胡先生原来的讲义的还很多，虽然是首尾不完之本。只因没有得到著作者的许可，书坊里不敢出版；此次你们印作自己的参考讲义，我想没有什么问题（似乎北大和师大都曾经油印过的），不过正式出版，作为定

① 指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这一周”专栏。——编者

本，那就要等胡先生回国之后再说。

现在我索性把我对于国语文学史的见解和对于这部讲义增删参校的经过分作六条，写在下面：

（一）秦以前（纪元前二〇〇以前）

这讲义不从秦以前编起，却把汉魏六朝标作第一编，当时沈兼士先生在《晨报副刊》上曾经提出抗议；后来凌先生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自序》中也〈要〉说，他和胡先生的意见大不相同，他是主张从唐虞编起的；我教这书的时候，也曾经补编了好几段秦以前的材料，大约就是《诗经》《楚辞》之类和先秦诸子中杂有方言的一些词句。现在一想，《国语文学史》断自秦汉，在胡先生确有相当的理由。他开场几句话就说明了：“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因为语文分歧，愈歧愈远，所谓中国文学史者，只让“文”的一方面独占了二千多年，“语”的一方面的文学，简直无人齿及，所以有特编《国“语”文学史》之必要；所以《国语文学史》要托始于语文初分歧之时代——战国秦汉间——而语文未分歧以前和既合一以后就不一定划入范围；所以他第一篇第一章的标题是“古文是何时死的？”古文未死，便是国语；古文已死而秘不发丧，叫

国语退匿民间，不得承袭“文统”，乃特编《国语文学史》，以发潜德之幽光。并且这是“文学革命”之历史的根据，或者也含有一点儿“托古改制”的意味。

战国秦汉之际，语文分歧，古文死了；那么战国以前，语文果然合一，古文果然是活着的吗？鄙见以为不然。战国以前，语文不但够不上说合一，而且够不上说分歧；后之所谓古文，在当时当然不以为“古”，但也说不上“活”——不是已“死”，乃是并不曾“活”。这种推定，完全是一种“唯物史观”，很容易明白的。第一，书契初兴，只是一种极简单的符号，其备忘表意的作用，比以前“结绳”的办法不过略胜一筹，岂能把整套的语言曲曲传出？说到语言，虽在太古，决不会像这路符号的简括：初民从习用的语言中，早已直接产生了文学，就是歌谣。但只能在口头耳畔相欣赏，到后来才传到竹帛上去，有些自然是伪造的，其不伪的，也一定失了本来语言的真面目；何况汉字这种符号，始终脱不了“结绳性”，是不能活泼地拼切古语、保留旧音的！即如《吴越春秋》（卷五）所载太古孝子作弹守户的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据刘勰说，这歌起于黄帝之世（要是靠得住，可算歌谣之最古者，向来选录古逸的也多把它冠首），是最早的一首“二言诗”；但现在调查各地歌谣，全首都是两个字一句的实在不经见，并且唱起来的音节也不合式，所以明黄生批评刘氏“此言未

知诗体”，以为“必四言成句，语脉紧，声情始切；若读作二言，其声啾缓而不激扬，恐非歌旨。”（见《义府》卷下）我想二言诗虽不是口里所有的，却是纸上能有的。现有一个比例，我们家乡湘潭地方，乡间道路多未修，满是粘土，民间为之谣曰，“落雨一锅糟；天晴一把刀”。清光绪中，王闿运先生仿《汉书》重修《湘潭县志》，在“八志”中的《地理志》内引了这首歌谣，他老先生却把它改为“雨糟；晴刀”两句二言诗了！但湘潭人谁都知道是绝对的五言。近人所以要如此者，是求句法的简古；前人所以要如彼者，也是求符号的简省：原因固然不同，其求“简”而不能密合语言则一，何况汉字这种符号，始终脱不了“结绳性”，比无论何种文字都要繁难，记载时的求简，更是人性之常了。（《诗经》的《国风》虽是采自民间，可以入乐的，我疑心有些不好念的四言篇章，也曾经受了当时诗人的斧削）第二，上古时的“文房四宝”又是何等艰贵而笨拙啊！纸，最初用竹片儿和木板，“简”“策”“簿”“籍”字都从“竹”，“札”“槧”字从“木”，“牍”“牒”字从“片”，至今物换而字未改；直到春秋战国间，才用缣帛（“竹帛”二字连书，始见《墨子·明鬼篇》和《韩非子·安危篇》）；至于“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创制的“蔡侯纸”，是纪元后一〇五年才得到政府的褒奖的（见《后汉书·蔡伦传》）。笔呢，当初用刀（但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刀是削牍的，不是刻字

的)，“兔毛笔”相传是秦蒙恬才创造的（见晋张华《博物志》）；墨是用的真“天然墨”——漆，后又发明一种石汁，到魏晋时才知道把漆烟松煤造成“墨丸”，在“凹心砚”上磨而贮之（见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四库书目》作《洞天清录》）。总之，从春秋到战国，“百家争鸣”，那些著述家却都是伏在极矮极矮的杌子上，拿一枝没有兔毛嘴的小竹管儿，点着漆，在那贵重的缣帛上（或刨得很平滑的竹片儿或木板上）一笔一笔的使劲写，现在想来，真费钱！岂但费钱，且不免如金圣叹批《续西厢》的话，“费手，费饭，费寿”呢。那么，省一句是一句，省一字算一字；改复词为单词，化散文成韵语，其动机不必在文学上，实是在经济上。试想在这种情况下，那还能委婉曲折的写出语文合一的东西来？“文房四宝”进化了，才够得上有写语体文的资格；后来印刷术也发明了，所以唐宋以后，文愈繁，书愈多；元明以来，可以产生那么博大的长篇白话小说；近来铅印石印的机器输入了，所以每天能出四五大张几万份的报。语文合一，到此也就没有物质上经济上的障碍了。然而这几年语体文虽通行，却还没有打白话电报的（不费钱的骈文官电不在此例），可见语言和文学上的唯物史观是不会错的，而秦以前的语文不能合一与竹帛上不能有纯粹的活文学也是无可疑的。

不得已而求其比较的接近活语言，又足以达出一

般平民的悲欢哀怨的，来补充这个长时代的国语文学史，《风》诗，自然是很可宝贵，应该首当其选的了，这是北部和中部的民间文学；南部的就是《楚词》，如《九歌》之类，也可入选。至于先秦诸子的学术文，和《左传》《战国策》等记事文，虽不是纯文艺，但多富于文学的趣味；文体虽不能与当时语言密合，但确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普通文体，绝非秦汉以后勉强保持强迫摹仿的死文学可比，而且所用的词头也大都是从当时语言中直接采取的；把它们算作近语的散文，实无不可。再往上推，《尚书》中的《盘庚》《大诰》之类，也可说为上古的语体散文。这都可以补选作秦以前之材料的。

(二) 汉魏六朝 (第一编 约当纪元前二〇〇至 后六〇〇约八百年间)

中国实行“国字统一”的政策，在筹备“国语统一”之前二千二百年，主持者是秦始皇和李斯；中国实行“文体复古”的政策，也在提倡“文学革命”之前二千一百年，主持者是汉武帝和公孙弘。这都是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秦皇汉武的这种功业，实在比那些并吞六国，置南海、桂林、象郡，通西南夷，通西域等等，还要雄伟；而近几年来这种运动，也实在比“五四运动”、“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其关系还要重大。本编第一章特述秦皇汉武这两件事，可谓史

眼如炬。

自从汉武帝用通艺补官的制度，推行“古体散文”用作全国统一的应用文体，同时提倡一种最时新的美术文——从《楚词》变化出来的“赋”，此后二千余年，庙堂上都依着这个例演化许多贵族文学：所谓“国语文学”者，其源头大都起自民间，大都是各时代从民间涌现出来的“反庙堂”的文学潮流，即如当汉初提倡“古体散文”和“词赋”的时候，民间的“歌谣”和“五言诗”也在那儿蓬蓬勃勃的盛行，这是绝不受庙堂体制之拘束的。最可怪者，它们的势力很大：“赵代秦楚之讴”，汉武帝也不能不爱，甚至于特设一条采访编制演习的衙门，叫做“乐府”，后来衙门的名称竟化为这种民间文艺的名称了；五言的《古诗十九首》以至《孔雀东南飞》等，大约都是民间之“讴”而经过当时好事的诗人之斧削的，斧削它，为的就是爱它，其动机和后来施耐庵(?)斧削罗贯中的《水浒传》而成今本《水浒传》，罗贯中斧削《三国平话》(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元建安虞氏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之一，最近有影印本)而成《按鉴演义三国英雄志传》，毛宗岗又斧削罗书而成今本《三国演义》一样。尤可怪者，它们的势力更进一步居然可夺庙堂文学之席：五言诗到了汉末，进而至于六朝，遂成文人学士最典重最流行的诗体；唐人的拟乐府，也不复视为民间之“讴”了。到此，五言诗和乐府的命运也就

告终，民间又涌现别种体裁的文学潮流，轰轰烈烈的侵入庙堂了。这些关系和变迁，须合三四千年来绘成一幅，便能一目了然；这图便算国语文学史的一个提纲挈要的引论，也算一个系统分明的目录。（在最近的过去，我曾制有一个《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内有一栏是表明文学潮流的，可参考）

这讲义的第一编第二章，就是讲“汉朝的平民文学”（纪元前一〇〇至后二〇〇，约三四百年间），所引的例不多；末了引的《孔雀东南飞》，我教学生时，曾把全文分段补入（《罗敷行》本不长，原文也未全引，我也补足了）。第三章讲“魏晋南北朝的平民文学”（二〇〇至六〇〇，约四百年间），这章比第二章编得有章法些，他把南朝的儿女文学和北朝的英雄文学分别得确有证据。《乐府诗集》里所收梁《鼓角横吹曲》六十五首和《木兰诗》二首（第二十五卷，《横吹曲辞》五），实在都是北方的民间文学，此外也还可以分析一些出来：因为史家多把南朝当正统，所以那时一切都是以南统北的。这种南北不同的情趣和风格，直到最近的长篇小说还是如此，北派爱说英雄侠义，南派爱说才子佳人（可参考胡先生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九章和拙制《潮流图》十九世纪栏）。这章中原文对于《木兰诗》也是节引，我也补足了。现在初级中学的国语科，《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大都是教过的（《木兰诗》已有乐谱，高小学生都能唱），这讲义中引

入全文，也有多少方便之处。

(三) 隋唐五代 (第二编 约当纪元六〇〇至
九六〇，大约四百年间)

隋朝和秦朝一样，年代太短，附作南北朝的收尾也可，提作唐朝的开篇也无不可。唐朝可算中国文学史的黄金时代了。单就民间文艺的影响看来，其势力也特别的大，初期的七言绝句（五言不便唱，所以不如七言的流行），晚唐的词，其潮流从民间侵入庙堂，简直和汉魏的五言诗与乐府演了同样的公式。印度佛教潮流从魏晋间起，一天一天的涌进来，晚唐禅宗的白话语录，渐流行而为讲学家书札讲义等应用文；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等，经有名的文人修饰润色而成为竹枝词和短篇小说之类，后来竟收入他们专集的，也不在少数（从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写本民间文艺，还是未经文人修饰的，有一部分印在罗振玉先生的《敦煌零拾》和刘半农先生的《敦煌掇琐》上辑中）。就说到“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他的“古文”也实在是“托古改制”；当时所谓为古文者，因为要和庙堂的骈体文为敌，故不得不再古一点，拿《六经》、《语》、《策》、《史》、《汉》之文来作高压式的对抗，其实韩柳等人之文又何尝真做得和《六经》、《语》、《策》、《史》、《汉》等一样呢？虚字的运用，语句的结构，多少受了些当时人们通用的语言的影响，这也不能不算

民间的势力了。到了五代十国，那些“皇帝词人”，竟完全服从平民了。（可参考拙制《潮流图》第七世纪至第十世纪栏）

这讲义第二编的章法比前编更好，他把向来批评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由盛而衰的旧说完全翻案；就文学的原理和上文所说民间势力的公式看来，确是颠扑不破的。第一章论“盛唐”，带叙初唐。（开国至武后时为初唐，六二〇至七〇〇，约八十年间；开元天宝时代为盛唐，七〇〇至七五〇，约五十年间）第二章论“中唐的白话诗”，白居易和刘禹锡自然是强有力的证人。第三章论“中唐的白话散文”其中有一个韵文散文五条支路的变迁表，最宜注意；“禅宗语录”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达的。（大约肃、代、德、宪、穆、武诸朝为中唐，七五〇至八五〇，一百年间）第四章论“晚唐的白话文学”（宣宗以后至唐亡，八五〇至九〇六，约五十年间）。第五章“论晚唐五代的词”（五代从九〇六算至九七五宋灭南唐止，约七十年间）。在五代的词内，我教的时候，曾经删去他所引的荆南孙光宪的《浣溪沙》一首，南唐张泌的《江城子》一首，因为其中有过露的艳句，用在课堂上有时不大相宜，若给那些所谓“教育家”看见了，尤其觉得碍眼，只得割爱。仔细想来，前编第三章所引的《子夜歌》《读曲歌》等，其中如“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这种艳体，为何不删？再进